

清初假隱風氣初論

吳志廉

香港樹仁大學

前 言

學界談到明清之際，對眷懷故國的「遺民」以及投靠新朝的「貳臣」尤其關注，當中承載其情感歷程與思想傾向的文本，在不同的政治環境與時代需求下有一「典律化」的過程。^[1] 然而，歷史由許多不同的面向組成，若只聚焦於重大事件衍生的「經典」所代表的某一面向，也許遮蔽了經典以外代表著不同面向的種種細節，誠如王汎森所言：「我們書寫歷史，往往只著重當時的主調，而忽略了它還有一些副調、潛流，跟著主調同時並進、互相競合、互相影響，像一束向前無限延伸的『纖維叢』。如果忽略了這些同時競爭的副調、潛流，我們並不能真正瞭解當時的主流」(50)，本文觸及的清初文獻，大多不屬於被文化主流圈子推崇的「經典」，亦不是學術界頻繁徵引的對象，但對於貼近清初的生活情境以及瞭解士人的思想變化，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2]

一般人提到「隱逸」行為，^[3] 就會聯想到高尚節操，尤其在明清鼎革的脈絡裏，隱逸具濃厚的政治意味，有不承認滿清政權的象徵意義。然而，綜合文獻可發現此一行為不一定被清人視作高尚，當它演變成一種利益計算的權謀，會被視作虛情假意而受到抨擊。這些耐人尋味的話語，於今日

August 27, 2021 收到稿件 / November 18, 2021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52 (January 2022): 71-96

§ 吳志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為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專任講師。Email: clng@hksyu.edu

的學界乃處於邊緣的縫隙，被後設的巨大經典遮擋，無聲無光，淡出主流視野；但這曾經明確存在的現象，也像交響曲其中一個調子，至少代表著清初歷史情境的某一橫切面。若認同歷史本來複雜，有不同面貌、多元聲音，難以整齊劃一，那麼清初的「假隱逸」現象，值得抉微闡幽。

趙園注意到明清之際士大夫對極端行為的批評，通常以「中」為尺度，例如黃宗羲認為「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為「皆過而失中節者」（趙園 2014: 283）。誠然，明清易代，一些表面上象徵著高尚情操的行為，若不能把握住分寸，標榜太甚，過而失中節也，甚至弄巧成拙，為人訾議。刻於康熙年間的《隱居放言》有一段睿智的論述：

大隱隱跡，市隱隱心。二者非有異同。客曰：「何謂隱心？」予曰：「人之心不澹，則生艷想；人之欲不靜，則生競心。二者非隱心也。心喜榮華，即思美其田宅，庇其妻子，盛其服食玩好，澹則無之矣；心喜奔競，即思廣其交遊，炫其學問，違其博辨雄談，靜則泯之矣。好靜者，心若枯禪，情同止水，燎之無炎，激之不汜，隨緣而已；好澹者，竹几藤牀，疏梅澹石，茶灶藥爐，衲衣襍被，安分而已。安分隨緣，悅情適性，是曰心隱。若必買山而居，築室而處，志在林泉，心遊魏闕，則終南有捷徑之譏，北山多移文之誚，吾恐慕為隱者之非隱也。」（夏基 11-12）

在出處進退的現實困境，不少人為了全身遠禍而加入歸隱行列，隱逸成為一時之風尚。對於此一風氣，作者以「隱心」為判斷隱士真偽的標準，主張外在的環境因素不是隱士的必要條件；內在的心境因素：好靜好澹而「安分隨緣，悅情適性」才是隱士的必要條件，兩者有本質上的差異。可見人不必拘泥於形式，動機不純者，處於林未必隱；心境淡泊者，處於市未必不隱。

值得注意的是，引文揭示清初不乏志在林泉，心遊魏闕的「假隱士」，¹⁴才有區分真偽的需要。雖然批評投機取巧的假隱士代不乏人，但據筆者的閱讀經驗可知，清初有關假隱士的描述、抨擊以及嘲諷為數不少，這些文獻的意涵為何？背後形成的原因是甚麼？當中有無別於前朝的特殊話語？迄今尚無系統梳理此一現象的研究。為了解答這些疑問，本文採取「跨文

類」^[5] 的研究方法，在不同類別如詩歌、文集、史書、戲曲、小說、筆記等的文獻基礎上，具體地勾勒清初假隱士的行為與心態。

本文結構分成四個層次：一、揭示清朝定鼎如何讓漢人的政治立場搖擺，旨在解釋為何「假隱」成為風氣。二、藉著呂留良詩作窺探士人對假隱風氣的鄙夷態度。三、以不同類別文獻證明清初普遍文人對假隱風氣有過厭惡。四、文人武將對仿陶者、仿夷齊者之批評連帶催生一些貶陶、貶夷齊之言論，實為清初特殊的現象，藉此窺見在歷代批評假隱的「共相」話語之外的「殊相」。

壹、清朝定鼎為假隱提供動機

為何清初密集出現對假隱士描述、抨擊以及嘲諷的話語？這要從時代背景說起。明清鼎革，天崩地坼，不乏殉國義士。^[6] 不就義者，亦以明遺民自居，絕意仕清，視滿族為民族仇敵，像傅山、歸莊、顧炎武、王夫之等遺民，都曾組織或參與抗清活動。然而，桂王的永曆朝於一六六二年覆亡後，復明大業，幾成死灰。南明朝傾覆前後，漢人對滿人之恨已比不上易代初期，默認清朝定鼎的話語，時而出現在清初文獻，乃至於出於遺民之口，^[7] 這可溯源自清王朝極高明的統治手腕。

清王朝入關後，即採取一系列文化政策籠絡人心。順治二年，清朝沿襲明制，恢復科舉取士，以示禮樂文明，不因政權轉移而中斷，並加強監控地方書院，確保教學體制配合科舉考試，考生人數逐年倍速增加。^[8] 康熙十八年，清廷開博學鴻儒科，拉攏有才幹卻不願參加常規考試之士，全國獲薦舉者達一百四十三人。康熙親自御試，錄博學鴻儒五十多人，授以侍講、侍讀、檢討、編修等職，併入明史館，纂修《明史》，一代碩儒如尤侗、毛奇齡、汪琬、朱彝尊均在此列；一些遺民像黃宗羲、顧炎武雖堅拒博學鴻儒之招，但特允親侄子弟參與《明史》之編纂。況且，清王朝對於一再拒仕的遺老多持寬容態度，《清史稿》云：「順、康間，海內大師宿儒，以名節相高。或廷臣交章論薦，疆吏備禮敦促，堅臥不起。如孫奇逢、李顥、黃宗羲輩，天子知不可致，為歎息不置，僅命督、撫抄錄著書送京師」（趙爾巽 1976a: 3183），可見清廷為免激起更大的反彈，於明遺民很少採取激進的懲治手段。清廷高明的統治手腕，以及對學術話語權的掌控，^[9]

調和了滿漢異質文化的衝突，令不少漢人甚至是遺民亦步亦趨就範於清王朝，間接承認朝代更迭已成命數，乃至於給予默許。

魏禧的記載揭示了士人的復國熱情與抗清勇氣隨著時日流逝而衰減，其〈諸子世傑三十初度敘〉云：「方乙酉、丙戌以來，初罹鼎革，夫人之情悵悵然若赤子之失其慈母；士君子悲歌慷慨，多牢落苑勃之氣；田野細民亦相與思慕愁歎，若不能以終日。及天下既一，四方無事，人心安於太平，而向之慷慨悲歎，遂亦鮮有聞者」(魏禧 2003: 579)，易代的民族羞辱所催生的憤懣無論多麼激烈，都被歲月巨輪輾平。明末清初，就出現不少以婦人喻士人之嘲諷(Li 391-479)，如孫子度云：「今日處士、寡婦，實是一轍。婦人無夫，即禮法蕩然，貞靜自守者，十不一二。但至佞佛，則濫觴無極矣。士人號方外，即廉耻掃地，自愛其品者，亦十不一二。若入聲氣，則靡所不為矣。齊國不嫁之女，不嫁則不嫁，而生三子。兩種人皆然。然處士知笑寡婦，而不知自反，可歎也」(張履祥 1871a: 17-18)，揭示守節遺民與守寡婦人，十不得一二，但失節之士竟恥笑失節之婦，實是五十步笑百步。

更諷刺的是，遺民黃宗羲的文集不時出現歌頌新朝之論，晚年的他常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康熙皇帝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採用清人正朔，甚至與清朝顯貴及降清明臣來往甚密。^[10] 三藩之亂，對於曾以醫術救治清兵的袁時中，黃宗羲竟冒晚節不保之風險，給予他肯定：「公通曉醫術，為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為害」(黃宗羲 1985c: 435)。這些與遺民立場相左的話語，一定程度揭示出遺老於清朝的反感程度已大不如前，甚至對其政權持默許態度。

部分明遺民雖拒絕與新朝發生直接的君臣關係，懼怕成為「貳臣」，但也願意以著述方式委婉地替新朝出謀獻策，從而實現遺民的生存價值與文化理想。遺老李顥〈答許學憲〉：

今誠乘詔求遺書，特疏上聞，請照康熙十二年頒賜《大學衍義》於各省大臣，例以《實政錄》通飭天下督、撫、藩、臬、道、府、州、縣各衙門，俾各做此修職業、勤政務，以圖實效。處處有快心之美政，則處處蒙至治之厚澤，三五熙皞，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李顥 176-177)

他充滿憧憬地向異族提出文化重建的方法，期許清王朝踵武三皇五帝的厚澤，惠及社稷蒼生，儼然臣子向君主獻議的口吻。除了李顥外，金堡、黃宗羲等人也不時藉著書寫替清朝規劃治國藍圖。諸人清醒意識到，清朝定鼎已是無法逆轉的事實，與其清高地冷眼旁觀，不涉世務，倒不如為家國重建、文化傳承出一分力，只要造福萬民，即便大節微污也在所不惜。換言之，明遺民間接地為百姓謀求福祉的同時，只要堅守不出仕的底線便可，^[11] 這些不起眼的貢獻，體現出黃宗羲認為遺民的人世之義是為「天下」、「萬民」，非為「一姓」的儒者理念（黃宗羲 1985a: 5）。

康熙朝吏治清明，邁向盛世，與晚明腐敗朝政、貧窶社會，構成對比。順治元年，多爾袞入關後即頒布：

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清歷朝實錄館臣 1985: 68-69）

廢除前朝苛捐雜稅，意在籠絡民心。同樣地，康熙尚輕徭薄賦之策，嘗論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訶罵，民生日蹙，深可為鑒」（清歷朝實錄館臣 1985a: 542），於是廢止圈地，鼓勵墾荒，地方若遇天災，即減免賦稅，惠及天下百姓。

因此，對於一些從晚明戰亂過渡到清初太平的人民來說，此番巨變讓他們「幸福」得有點不知所措。像清朝成功解除在餘姚的一場水災，黃宗羲難掩興奮之情，曰：「萬民歡呼雷動，起於白骨，即未受災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1985b: 138）。又如遺民魏禧〈紀夢〉一詩，他很迷惑地質問諸生：「汝今溫飽誰之德？」；並記述他對亡父說：「今年天變良已極，時平物賤歲屢登，河清海晏，穀熟年豐，實該慶幸，豈料他說罷「不覺痛哭聲俱失」（魏禧 2003: 1322）。^[12] 這是一種既不想稱譽新朝而愧對故國，又不得不承認新朝為天下百姓帶來幸福的矛盾，諸如此類難以名狀的複雜情緒，不時出現在明遺民的論述當中。

可見故民遺老有人性的軟弱，也有謀生的考量，更有為萬民造福的抱負，何況他們面對的是日益清明的新朝，自有遊移不定的內心掙扎、相互交錯的政治立場，舉動與心態不無前後矛盾。

上文通過不同文獻的相互印證，說明漢人的亡國之恨已比不上易代初期，揭示清朝定鼎如何讓漢人的政治立場搖擺。明乎此，就不難理解為何「假隱」成為風氣，因為對於忠於前朝的遺民來說，堅守志節或立場不變已不是易事，更何況一些在本質上是貪圖「虛名」與「實惠」之士？他們大多擋不住利祿誘惑，放棄隱士身份，一窩蜂地爭相仕清，或者以歸隱手段達到出仕目的，詳後。

貳、清初文人對假隱風氣的批判

一、呂留良詩歌對假隱風氣的嘲諷

在芸芸士人之中，呂留良（晚村）不厭其煩地以詩歌嘲諷假隱士，這些詩作，時而憤懣，時而戲謔，寫活了假隱士的心態與行為，具有典型意義，很值得作為一個側面深入瞭解清初的假隱風氣。^[13] 順治九年，晚村作〈東莊雜詩〉，其三云：

老樵不謀隱，所居本自高。名士矯清節，恐無松柏操。仕宦有捷徑，無乃終南皋。幅巾且芒屨，廣袖何蕭騷。肝腑中夜熱，徘徊理鉛刀。入拜朱門旁，出為蓬戶豪。但能飽味嗜，寧復矜羽毛。有敕放還山，頓首露危尻。臣非首陽儉，安能常磬磬。書往長樂公，其門多女曹。（呂留良 2015: 116）

俞國林評之曰：「寫名士醜態，可稱惟肖」（呂留良 2015: 118），此詩嘲諷名士虛偽的嘴臉，可謂入木三分，下文析論之。這些人本無松柏情操，但求以終南捷徑，^[14] 獲詔入仕，軌高調地託跡山林，唯恐天下不知。「肝腑中夜熱，徘徊理鉛刀。入拜朱門旁，出為蓬戶豪」，形象地披露其醜態，他們一方面偽裝遁隱，另一方面熱衷利祿，每每干謁權貴，奔走朱門。「有敕放還山，頓首露危尻」，俟詔令一出，名士欣喜若狂，叩首謝恩，隱士之儀態與風度，付諸闕如。「書往長樂公，其門多女曹」，長樂公，指五代宰相

馮道，其一生仕唐、晉、漢、周四朝，相十帝，自號長樂公。《新五代史·雜傳》：「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歐陽修 614），晚村視清初假隱士為長樂公，諸人以歸隱手段謀求加官晉爵的政治本錢，一旦利誘當前，節操全失，更事二主。「其門多女曹」，揭糞清初踵武馮道之士，屢見不鮮。馮道令人不齒，在於更事四主而不感羞辱，還將之視為「長樂」之道。晚村將名士比擬為馮道，痛詆一些熱衷仕途、卻自視高尚的無恥之徒。

康熙四年，晚村〈耦耕詩〉之六云：

名絀清流異代尊，近聞隱跡在朱門。

織簾賣藥終南徑景宣，屬稿呈詩秋壑園蘭生。

角里僅存芝練骨端明，孤山長往鶴消魂聞魏美信。

可憐傳記人誰託，歇熱田塍子細論。（呂留良 2015: 444）

「景宣」、「蘭生」、「端明」、「魏美」為誰？嚴鴻逵與俞國林曾予以考證。^[15]嚴鴻逵《釋略》云：「前半必有所指，而不明言，存厚也」（呂留良 2015: 446）。揭示此詩沒附名號的句子，^[16]其諷刺當有所指。相關詩句，傳神地描繪名士醜態。首聯云陵谷巨變，名士爭趨歸隱，然所隱之處乃朱門宅第，不願捨棄世間富貴。尾聯不屬「前半」部分，但揆度句子，沒後附名號，或有曲筆，本文提供一個可能解釋：二句嘲諷名士退隱江湖，卻唯恐其仙風道骨、閒雲野鶴之形象，不為世聞，故為託誰立傳而費煞思量，務求以短暫的遁世，換取不朽的聲名。

其後，晚村作〈和種菜詩〉二首。^[17]康熙十四年，吳孟舉作〈種菜詩〉，邀天下才俊賡唱，和者計有黃宗羲等二十多人，^[18]誠為文苑盛事。然揆諸其內容，^[19]大多漫談田園生活，附和孟舉高澹雅趣，少深意寄焉。緣此，晚村作〈和種菜詩〉，序云：「自牧出示時輩和種菜詩甚夥，皆不堪置目，不覺失笑，走筆和之。」連篇累牘、內容空洞之賡酬詩，於晚村眼中，無異乎笑話，故下筆老辣，以「此間那有故侯瓜」譏之。《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

世俗謂之『東陵瓜』(司馬遷 2017)，召平乃秦遺民，以種瓜寄寓孤臣孽子之感。可見晚村於清初諸老，絲毫不客氣，直訾諸公酬答為樂，自許風雅，終日徜徉煙霞水石，以隱士自居，無復東陵遺志。

康熙十五年，晚村又作〈又自和種菜詩二首〉：

〈其一〉

婢嬾童驕老僕尊，先生自把鑿頭捫。閉門不入英雄隊，且了殘書
答菜根。

〈其二〉

一陣西風箬笠斜，冰沙堆裏養萌芽。鄰翁怪我慳懼甚，颺卻甜瓜
下苦瓜。(呂留良 2015a: 881)

第一首嘲諷從事農耕的名士，諸人及其婢僕大多驕矜無能，於實際操作一無所知，滑稽得很。晚村更以「英雄」比擬不諳實務的諸公，反諷深刻。第二首自剖心跡，詩人恥與這些欺世盜名的隱士為伍，一如他不喜軟熟之「甜瓜」，反喜淡泊之「苦瓜」，揭示其對歸隱風尚的不滿。

晚村意猶未盡，進而作〈孟舉索予和又成六首〉：

〈其一〉

有理方知果蕨尊，無機任取甕棹捫。架繩引蔓還枝葉，刈草挑蟲
到本根。

〈其二〉

芥自當心薤自斜，無根芡菌也抽芽。與君同喫孤兒苦，不向車頭
泣啜瓜。

〈其三〉

千里故人同一尊，提籃赤腳水中捫。幾年菜箸不相入，風味依然
在舌根。

〈其四〉

溝塍斷處嫩頭斜，倒地生鬚別有芽。未必是中無捷徑，梁州試與
進胡瓜。

〈其五〉

蔬果京華品第尊，溪毛只合野人捫。浪傳力士新題句，鬧煞牆陰老薺根。

〈其六〉

苦竹樓纏馬眼斜，怕教蹴蹋水晶芽。老僧記得曹溪案，不入園人許喫瓜。（呂留良 2015a: 882-883）

這組詩一方面渲染田園野趣，一方面諷喻假隱風氣。其四：「未必是中無捷徑，梁州試與進胡瓜」，「進胡瓜」，典出陸贄〈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20] 唐建中四年，朱泚叛亂，德宗帶了百官一路跑到奉天，史稱「奉天之亂」，其間有百姓進獻果子胡瓜，德宗擬各與散試官，後來遭到陸贄的反對。可見「終南徑」、「進胡瓜」之義類近，同指以最少的付出獲得最大的官爵利益，蓋指清初投機取巧者。

其五：「浪傳力士新題句，鬧煞牆陰老薺根」，諷之尤深。高力士嘗作〈感巫州薺菜〉，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高力士 2001: 1536）。原題注：「力士謫黔中，道至巫州，地多薺而人不食，因感之，作詩寄意」。公元七六〇年，高力士在玄宗被軟禁之後罷黜到了巫州（今湖南懷化），此處遍生薺菜而無人食，遂寫下此詩。高力士借薺菜言志，說明雖然被流放至荒僻之地，但自己對君王仍忠心耿耿。晚村指出當時的假隱士爭唱力士句，表面上借「夷夏雖有殊」之「古典」，突出眷懷故國的之「今事」。然而，諸人只想湊熱鬧，人云亦云，望以羣體認同躋上道德高地。這種高姿態的自我表演，在眼村眼中，實是矯揉造作，沾汙了潔淨的田園世界。

晚村其他的詩如〈耦耕詩〉其一之「募乞買山真戲語，零丁誓墓即求名」（呂留良 2015: 443）、〈耦耕詩〉其四之「才說尋費去耦耕，定知不是耦耕人」（呂留良 2015: 443）等等，都有嘲諷假隱風氣的傾向，可以說是相關批評話語中一個代表性的縮影。當然，除了晚村，不乏清人以詩歌嘲諷假隱士，如丁耀亢有〈歸山不易詩倣元白體〉組詩十九首，其十云：「歸山良不易，真隱古人稀。渭水無遲暮，終南有是非。聽松吹好夢，把菊見忘機。出處關人望，佔星識少微」（丁耀亢 2）。所謂「終南有是非」，揭示

從古至今，隱居終南山若淪為求名、求利、求官的便捷途徑，容易引起爭議。

二、其他清初文人對假隱風氣的厭惡

本節綜合不同文獻嘗試說明，晚村不遺餘力用詩歌嘲諷清初的假隱士，並非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折射出許多清初文人對此一行徑的厭惡，具有普遍的意義。不妨從戲曲說起。《續牡丹亭傳奇》為清初遺民陳軾所撰，是湯顯祖《牡丹亭》之續作。值得關注的是，《續牡丹亭》把陳最良刻劃成一個喜好功名之士，已為黃門官的他不滿職階太低，主動要求杜寶提拔他，後遭拒絕（陳軾 16-20）。陳最良後因杜寶失勢而被牽連革職，傷心得「拿紗帽大哭」，妻子石道姑勸他歸隱，他卻認為無官之士都是「山林賤相人欺侮」（陳軾 63-67）。在第三十七齣〈假隱〉，仍戀棧官位的陳最良，決意孤注一擲，偽裝象徵隱逸的漁翁，望以「終南捷徑」復官：

〈步步嬌〉（末扮漁翁搖船上行介）

翠憶朱輪難追購。綺殿空懷舊。生涯倚去舟。箬笠青簑，且作文綉。捷徑漫凝眸。權當終南叟。心為白蘋留。煙波處處愁。予生何護落，我道付滄洲。俺陳最良，為因大計，老耄久經休致，別無事業可做。我想古人避世逃名，行咏澤畔，謂之隱逸也，有一般假托名高、借題隱士，雖是山林沉澗，卻是仕宦梯階。我如今不免走此一條門路，收拾一個小艇，就在富春江充做一名漁父，萬一朝廷搜求遺逸，我陳最良就好出去應詔。（陳軾 130-131）

為了增強戲劇效果，陳軾還安排了一個真漁夫去諷刺這個假漁夫：「你這老頭兒，說了半日都是一團胡話，你好污吾耳也。我這富春江上，飛席乘風，迴流蕩日，視軒冕如淄塵，薄公侯如草芥，多少清門快志，豈許患得患失的鄙夫在此打混！可恨可笑，原是個假漁父」（132-133）。饒有深意的是，陳最良假隱沒多久，朝廷即下詔讓他復職，他高興得立刻「拋簑笠，換冠帶」、「謝天謝地」（134），描繪逼真，滑稽至極。

不單是《續牡丹亭》，《桃花扇·餘韻》亦有類似情節：

（副淨醒，作悄語介）聽他說話，像幾個山林隱逸。（起身問介）

三位是山林隱逸麼？（眾起拱介）不敢，不敢，為何問及山林隱

逸？（副淨）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們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副淨）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孔尚任 261）

《桃花扇》傳神刻劃出「高瞻遠矚」的名士，看穿他們一早躲在深山裝模作樣，是為求朝廷徵求隱逸，可謂利慾薰心，非真正隱士作為。上述情節蘊含兩則重要訊息。其一，《續牡丹亭》提及的「萬一朝廷搜求遺逸」，以及《桃花扇》提及的「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與清朝優待知識分子的政策頗類似。順治元年，清世祖頒詔天下：「故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堪為世用者，撫按薦舉，來京擢用。文武制科，仍於辰戌丑未年舉行會試，子午卯酉年舉行鄉試」（趙爾巽 1976: 90）。說明「搜求遺逸」一語非文學家杜撰，乃出自清廷網羅賢士的相關政策。其二，《續牡丹亭》、《桃花扇》相關的挖苦，不無蘊含文人對清初假隱士的批判態度，蓋清初不乏「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的虛偽之士。王應奎《柳南隨筆》載：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櫬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165）

《歷年記》、^[21]《堅瓠五集》、^[22]〈錢螯菴徵君述〉^[23]亦有相似記載，這些文獻反映順治、康熙年間，不乏偽裝伯夷、叔齊之士故作姿態，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在清廷開科取士的利誘下，即無風骨可言，爭相應試出仕。但這些人既揚棄隱士之名，又無應試之才，難免「虛名」與「實惠」俱失，下場令人發噓。這些嘲諷的詩歌，當有戲謔成分，但若無大量假隱士的湧現，相信不會催生這些戲筆，誠如《歷年記》所言：「此詩雖俚，而切中時事，可以觀民風」（姚廷遴 64-65）。《柳南隨筆》亦曾記載「康熙丁

已、戊午間，入賞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王應奎 68）的情況，嘲諷時人就範於新朝的詩歌於焉而生，^[24] 可見清廷廣泛籠絡人才的策略頗為奏效，讓不少原本立定腳跟之漢人入異族彀中，引發種種的嘻笑怒罵。陳去病云：

務祛積垢，隆師重道，廣徵山林隱逸，起用臣靡，予之寵秩，累開賢良方正、博學鴻詞諸科，以利祿為餌，凡其人有一節之長，一材可取，罔不多方羅致，以為所用……其操之有術，如王良御轡，壑控縱送，而雄駿不能絕其繮，故當時之士，苟非為船山之匿身石窟，舜水之遯蹟扶桑，即未能免於當道之所物色。(1367)

乃深刻概況清初漢人對清廷態度之轉變，世運更迭之現實、趨利避害之人性使然也。

誠如前述，此類批評與戲謔是特殊歷史背景的產物。明清鼎革之初，在輿論壓力之下，大量士子義憤填膺，絕意仕清，遁跡山林，作一遺世獨立之士。^[25] 然而，清廷政權得以鞏固，加上科舉之復行、山林隱逸之徵召、博學鴻儒之詔取，威逼利誘之下，一些歸隱之士多抵禦不住誘惑，爭趨迎合新朝權貴。黃宗羲〈陸汝和七十壽序〉：「慨然記甲子蹈東海之人，未幾已懷鉛槧入貴人之幕矣；不然，則索游而伺閭人之顏色者也」(1985e: 659)，乃譴責清初一些遁隱沒多久，即不甘寂寞出來攀附權貴的人，暗示他們當初的隱逸，只為了積累清譽，他日若得到權貴提拔，大可「東山再起」。戴名世〈溫滌家傳〉：「明之亡也，諸生自引退，誓不出者多矣。久之，變其初志十七八」(201)，江河易色，風景殊異，清初不乏高蹈遠舉者，但同時有避世邀名之流；後者也許一時衝動，誓不仕清，但意志薄弱，守節未遂，故從山林地回歸名利場。諷刺的是，孫默欲歸黃山，望天下名士賜送別之文，此舉即受到王巖的勸阻：「古之隱者入山惟恐不深，其聲影幽墨，惟恐人知，即其託跡所在，未嘗使人識而名之……吾願孫子息交遊、遠名譽，勿復徵送行之作，而果於歸去，使人莫測其歸也，孫子乃庶乎真隱矣」(劉寶楠 272-273)，生怕不為別人關注的高調隱逸，徹底顛覆了「真隱士」不為世聞的價值取向。

隱逸典範陶淵明，其高尚道德為後世奉為圭臬。因此，清初許多人在

言行上倣仿陶淵明，錢謙益〈陶廬記〉云：「今世隱約之士，俯仰無聊，哦幾篇詩，種幾叢菊，咸以柴桑自命，殆長公所云『陶淵明一夕滿人間』者」（1009），所述隱士是否附庸風雅，博取虛譽，殆難深究。但在部分文人眼中，大量假隱士的湧現，讓隱逸之舉變得濫俗，大為貶值。究其因由，誠如彭士望〈與王乾維書〉所言：「今則惟陶元亮、謝疊山滿天下耳……元亮寬易，宜效者眾，使其有知，必恨且悔，以為不幸其侑也」（彭士望 1837：卷1）。倣仿陶淵明之成本與門檻俱低，吸引不少人加入投機取巧的隊伍。

易代之際，隱士以遁世行徑抵抗不義政權，其不合作的態度是宣示志節的行為方式，其躬耕自給、不慕名利之言行，能喚醒世人的道德良知，有一定的感召力。然而，理應稀少的隱士卻充斥天下，證明不乏招搖撞騙者混跡其中。傅山說得更直接，其〈口號十一首〉之八：「高尚名歸義士羞，只緣人見彼王侯。鈎除巢許嚴陵老，隱逸真堪塞九州」（528），揭示假隱士的數量多得令人震驚，雖不無誇大之辭，但亦說明了擅於鑽營的虛偽士子為數不少，才激起了清初普遍文人對其行為的厭惡。綜上，本文將批評話語所針對的「假隱」行為，描述為一種「風氣」，大致可成立也。

參、清初假隱風氣下的特殊話語

一、陶淵明形象之貶損

陶淵明經歷了宋人的「典律化」後，很少受到批評，其於晉宋易代恥事新主的道德情操，於清初遺民語境中有著感召意義。^[26]雖然如此，歷史眾聲喧嘩，在清初假隱成風的氛圍下，文人武將對倣陶者之批評連帶催生一些貶陶之論，實為清初特殊的現象。

張煌言有〈反乞食〉組詩，^[27]顯然是脫胎自陶淵明〈乞食詩〉，^[28]何意云「反」？意味深長。據傅氏長恩閣抄本，詩人自註曰「起甲辰六月」（張煌言 373），即康熙三年，時張煌言走投無路，退居懸壘。張氏為復興明室奔走近二十年，順治十六年己亥，鄭成功長江之役敗退後，^[29]張煌言仍糾集民間力量，繼續於浙東沿海一帶抗清。惜勢窮兵敗，清廷定鼎難以逆轉，一代名將身陷末路，因行跡被清軍偵知，於康熙三年，於杭州遇害。^[30]可知此詩稱得上是張煌言臨死之前的遺作，充分反映出其一生信奉的

價值觀。詩〈序〉明確提出創作緣由：

山中屢空，泊如也，偶讀淵明飢驅句，猶覺其未介，遂作反乞食詩，仍用其韻。（張煌言 373）

張煌言以獨特的生命情境去解讀陶淵明，同是末路淒惶，饕餮不繼，陶淵明因「飢來驅我去」而向現實低頭，選擇「乞食」以維生；然張煌言即便「山中屢空」，仍淡泊自如，因此大膽地對素以耿介見稱的陶淵明發出道德譴責，批評他「其未介」。此一對典故資源的挪用與顛覆，將其於窘境下仍堅守的志節表露無遺。〈反乞食〉詩云：

〈其一〉

悲風變陵谷，余行將安之。浩然懷黃綺，燁燁紫芝詞。清聲泐金石，孤情獨往來。彭澤何人斯，東籬戀酒杯。微祿已不耽，沾沾乞食詩。乞時自有意，可以觀其才。吾則愛吾鼎，白雲倘分貽。

〈其二〉

西山有餓夫，褰裳欲就之。或言舉世腴，君癯甯有詞。流水淡須眉，天真所由來。况也朝市改，志士寡深杯。療飢託藜藿，甯識招隱詩。今古多肉食，誰為天下才。珍重墨胎氏，靈龜幸見貽。

〈其三〉

三旬九遇食，我聞古有之。不貪以為寶，無受亦無辭。奈何饕餮者，朵頤鼎鼎來。乞哀在暮夜，餘羹僅一杯。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緬維珠樹鶴，清高未易才。芝田良足耕，嘉禾聊自貽。

（張煌言 373）

此一組詩除了對陶淵明有微言，也對時人倣陶乞食的現象有所嘲諷。第一首問陶淵明「何人斯」，已有鄙夷的意味，答曰「東籬戀酒杯」，突出其沉迷酒精的形象。詩中更發前人所未發，說陶氏表面上不耽於微祿，但是卻為自己的〈乞食詩〉「沾沾自喜」，揭示其思想與行為形成衝突。作者說：「乞時自有意，可以觀其才」，時窮節乃見也，間接批判陶氏非如前人所說的高風亮節，他畢竟抵不住生存壓力（食）與物質誘惑（酒），選擇乞食，而且還為此撰成詩篇，有自矜之意。

第二首，作者視角似從晉宋轉到現今，對照真隱士與假隱士，突出後者的虛偽。張煌言認為真正的隱士應是「或言舉世腴，君癯甯有詞」、「療飢託藜藿，甯識招隱詩」，不會有反覆標榜自己苦行的虛文，何況現在「朝市改」，似指明清鼎革，志士理應為此「寡深杯」，怎忍心縱酒作樂？可惜「今古多肉食」，面對物質的誘惑，鮮有人如伯夷（墨胎允）、叔齊（墨胎智）般以不食周粟的方式抵抗政權，目下多是未能落實浮言的假隱士。

第三首，嘲諷時人的意味愈形強烈。「奈何饕餮者，朵頤鼎鼎來」，那些如饕餮般貪得無厭者，唯恐不能大快朵頤。「斟酌既飽滿，猶吟和陶詩」，他們四處乞食，終至酒食滿腹，卻假裝隱士吟誦和陶詩，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可見〈反乞食〉詩，作者「反的」是當下援引陶詩作為行為依據的假隱士，他們不能堅守口頭上的道德原則，甚至其行為本身與隱逸理念大相逕庭，大抵經不起「聽其言而觀其行」的考驗。

張煌言為了增強對假隱士的批判，進而質疑他們援引的理論依據，闡明乞食之陶淵明不見得絕對清高，可見其對陶氏的質疑一定程度是出於對時下假隱風氣的不滿，兩者互為表裏。據〈葉羅二客傳〉記載：「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遺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無乃激使往乎？乃止」（邵廷采 271）。說明了張煌言一直鄙視這些假裝逍遙世外的隱士，連帶責問其一直掛在嘴上的陶淵明之氣節。

陶淵明萬不得已的乞食行為，大多得到後人諒解，況且陶氏自言「叩門拙言辭」，其耿介的個性令「乞食」此一謀生行為成為了高潔的象徵。可是到了清初，乞食的合理性卻受到懷疑，甚至惹來嘲諷。呂留良〈真進士歌贈黃九煙〉交代一般的士人「所憎有數種」，其中一種是：「其五貧士尤可憎，來非乞食定貸逋。見之先當道貧苦，若待開口難枝梧」（呂留良 2015: 228）。乃借他人聲口提出應對乞食行為的策略，主人應在貧士乞討施捨之前，先聲奪人自道貧苦，否則難以閃爍其詞打發他們。可見在清初某些語境裏，乞食此一行為會為他人帶來煩惱甚至是憎恨，反映了以陶淵明為代表的乞食行為，在部分人眼中已由「高潔」轉化成「齷齪」，讓原本正面的象徵意義受到貶損，背後當與清初為數不少以隱士之名行乞食之實之現象有關係。

二、伯夷、叔齊形象之貶損

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退隱首陽，采薇蕨而食，遂餓死山中，是商周之際的節義之士，稱得上是明遺民的道德楷模。但在朝代更迭的歷史總有多元的聲音，清初文人因為鄙視經常把伯夷、叔齊掛在嘴上的假隱士，連帶出現了貶損伯夷、叔齊形象的話語。魏叔子〈詠史詩和李咸齋〉：「隱當為太公，不當為伯夷。擇地釣渭水，乃為西伯師。德公處襄陽，諸葛僑隆中。既當都會地，亦多豪傑從。但使處孤僻，時務安得通」（魏禧 2010: 782-783）。直言退隱如伯夷不是最高的理想，反而姜太公待君而用的態度，在進退之間的抉擇保持靈活，更有益於世，把消極避世的伯夷比下去了。

黃宗羲〈王義士傳〉：「太史公謂伯夷義不食周粟者，蓋伯夷先時歸周祿以養老，隱於首陽，始不受祿，故謂之不食周粟也。若以率土之粟為周粟，則薇與粟何擇焉？台輔之法伯夷，無乃誤乎？」（1985d: 566）此語尖酸刻薄，提醒法伯夷者其採薇充飢之「薇」與「周粟」何異？畢竟「率土之粟為周粟」也，因此黃宗羲對伯夷的節操是有保留的，如其於《孟子師說》所言：「伯夷一派，流而為避世之士」（1985a: 126），他未能充分肯定伯夷，其中一個原因當是不滿隱匿山林的避世者。

清初艾衲居士《豆棚閒話》有一則〈首陽山叔齊變節〉的小說，把守節的故事轉化成「變節」的鬧劇，其顛覆原作的幅度前所未有的大，極盡嘻笑怒罵之致。小說敘叔齊隨伯夷隱入首陽山後，身心受盡磨難，久經掙扎，終抵擋不住誘惑，決意離開伯夷準備出仕周朝。

導致伯夷變節的背景，尤堪注意，小說云：

夷齊二人，只得輪心貼意，住在山中。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到也清閒自在。那城中市上的人，也聽見夷齊扣馬而諫數語，說得詞嚴義正，也使激動許多的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縉紳、告老的朋友，或是半樞不尬的假斯文、偽道學，言清行濁……猶如三春二月燒香的相似，都也走到西山裏面來了。（艾衲居士 83）

原本夷、齊二人在山中也樂得逍遙，但當「假斯文、偽道學，言清行濁」之士一窩蜂湧上山，剝奪了山上供給夷、齊二人的食物資源與生存空間，導致叔齊出現以下的內心鬥爭：

前日粗心浮氣，走上山來，只道山中惟我二人，也還算個千古數一數二的人品。誰料近來，借名養傲者既多，而托隱求徵者益復不少，滿山留得些不消耕種、不要納稅的薇蕨蕢糧，又被那會起早佔頭籌的採取淨盡，弄得一付面皮薄薄澆澆，好似晒乾癟的菜葉，幾條肋骨彎彎曲曲，又如破落戶的窗櫺。數日前也好挺著胸脯，裝著膀子，直撞橫行。怎奈何腰胯裏、肚皮中軟噹噹、空洞洞，委實支撐不過。猛然想起人生世間，所圖不過「名」「利」二字。我大兄有人稱他是聖的、賢的、清的、仁的、隘的，這也不枉了丈夫豪傑。或有人兼著我說，也不過是順口帶挈的。（艾衲居士 85）

乃維妙維肖地刻劃出叔齊的道德困境與心路歷程，他悔而入山，明白到人生所圖不過「名利」二字，但自己所有的義舉都位列伯夷之後，既然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卻要過著「腰胯裏、肚皮中軟噹噹、空洞洞」的艱難生活，委實不划算。更何況「借名養傲者」、「托隱求徵者」把山上的免費的薇蕨採取殆淨，讓其枵腹難熬。

叔齊不再隱居，下山遇到守節立場搖擺的眾獸，便開導他們：

當此鼎革之際，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弭不來，正當借重你們爪牙吞噬之威，肆此吼地驚天之勢，所謂應運而興，待時而動者也。為何也學了時人虛僞氣質，口似聖賢，心同盜跖，半醒半醉，如夢如痴，都也聚在這裏，忍著腹枵，甘此淡薄，卻是錯到底了。（艾衲居士 87）

乃提醒眾獸不要學「虛僞氣質，口似聖賢，心同盜跖」之時人，何必枵腸輾轉，受盡折磨？眾獸被說服後，決定放過叔齊，叔齊便道：

我叔齊真僥倖也！若不是這張利嘴，滿口花言，幾根枯骨幾乎斷送在這一班口裏，還要憎嫌癩蟲氣哩。（艾衲居士 87）

以戲謔之筆將叔齊圓滑、狡黠的形象寫得躍然紙上，揭示這「滿口花言」的利嘴所圖的無非是生存與利益。

叔齊下山投誠周家兵馬，卻被士兵認得是伯夷之弟，被罵道：

你世受商家的高爵厚祿，待你可謂不薄，何反蒙著面皮，敗壞心術，就去出山做官！即使做了官兒，朝南坐在那邊，面皮上也覺有些慚愧！況且新朝規矩，你扯著兩個空拳，怎便有官兒到手？如此無行之輩，速速推出市曹，斬首示眾！（艾衲居士 89-90）

此話道盡了叔齊背義棄節的醜陋，亦諷刺他既得不到高士之「名」，亦無用世之才，自難謀「利」，背離了其「所圖不過『名』『利』二字」的人生追求，諷刺至極。通篇描寫，誠如小說〈總評〉所言：「滿口詼諧，滿胸憤激。把世上假高尚與狗彘行的，委曲波瀾，層層寫出」（艾衲居士 92），揭示伯夷正面形象的扭轉與醜化，是源於作者對清初沽名釣譽的行為懷有極大憤懣，可見小說以借古諷今的方式恥笑時人的功利嘴臉與矯飾風氣。稍作延伸，尤侗〈西山移文〉顯然仿照〈北山移文〉，將偽裝隱居而求富貴的時人醜態表露無遺，文曰：

許由之瓢以盛魚肉，嚴陵之竿以釣圭組，太史之簡以頌昇平，司農之笏以朝新主。左顧箕山，右瞻伊子，莫不起而弔予曰：「夷與齊與，與汝居者，斯人之徒與。」嗚呼！逸民既往，空山無託，誰覩面目，遂欺丘壑。且夷齊之侶，不過兄弟，爾輩所至，呼朋引類，來如牛馬，去如鬼魅；夷齊之歌，不過數言，爾輩所作，累牘連篇，蠅唱蚓和，傳寫田園；夷齊之食，不過薇蕨，爾輩所吞，酒肴饕餮，既醉既飽，驕人清節。（尤侗 12）

作者通過伯夷、叔齊與假隱士的對照，肆意地嘲笑後者「欺丘壑」的浮誇行為，當中的「釣圭組」、「頌昇平」、「朝新主」，不無折射出明朝與清朝勢力此消彼長的轉折歷程，揭示不乏漢人識時務地棄明投清，是認清局勢、順應潮流的政治選擇。

結 論

歷史由許多不同的面向組成，若只聚焦於重大事件衍生的「經典」所代表的某一面向，也許遮蔽了經典以外代表著不同面向的種種細節。本文觸及的清初文獻，大多不屬於被文化主流圈子推崇的「經典」，亦不是學術界頻繁徵引的對象，但對於貼近清初的生活情境以及瞭解士人的思想變化，

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價值。

清初有關假隱士的描述、抨擊以及嘲諷為數不少，迄今尚無系統梳理此一現象的研究。本文採取「跨文類」的研究方法，^[31] 在不同類別如詩歌、文集、史書、戲曲、小說、筆記等的文獻基礎上，嘗試闡明：清朝定鼎導致漢人的政治立場搖擺，為「假隱」提供了動機；藉著呂留良詩作窺探士人對假隱風氣的鄙夷態度，並證明清初普遍文人對假隱風氣有過厭惡；最後闡述清初文人武將對倣陶者、倣夷齊者之批評連帶催生一些貶陶、貶夷齊之言論，藉此窺見在歷代批評假隱的「共相」話語之外的「殊相」。

這些批評話語，時而憤懣，時而戲謔，生動而具體地勾勒了假隱士的行為與心態，可見「假隱」作為一種貪圖「虛名」與「實惠」的造作行為，確實在清初形成了一股「風氣」，因此在不同文體都衍生了相應的批評聲音。隨著清朝政權的鞏固，相關批評持續出現，不失為一個側面窺見漢人漸漸就範於清朝統治的歷史進程，藉此瞭解到清初士人對清政權從抗拒至容受之政治立場、文化心態之轉折。張履祥〈與唐灝儒〉曰：「方昔陸沈之初，人懷感憤，不必稍知義理者，亟亟避之，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既五六年於茲，其氣漸平，心亦漸改，雖以嚮之，較然自異，不安流輩之人，皆將攘臂下車，以奏技於火烈」（1871: 6）。所謂不安流輩之人，指涉甚廣，蓋包含不甘寂寞之假隱士。最後以錢光繡〈昔日夷齊行〉之詩作為本文的佐證，其對部分地區「今之夷、齊」的描摹逼真傳神，極盡挖苦之能事，儼然一篇假隱士傳記，詩曰：

昔日夷、齊餓且死，今日夷、齊富更驕。侈談忠義殊耿烈，行與狗彘同貪饕。或習大腹賈，錙銖盡錐刀。或效田舍翁，阡陌連青郊。或托沿街鉢，萬貫腰纏鶴背高。或曳王門裾，由竇屈膝連雕尻。或操許劭評，旦舜暮蹠恣彈褒。或撰魏收史，媚詞諛墓同虛囂。東家鞏金供潤筆，西家束幣求題標。童僕賤紈綺，珍錯羅中庖。飛觴列俎醉賓客，撞鐘舞女忘昏朝。回首首陽薇與蕨，刺喉螫吻疇能肴。慚彼洛邑民，當日稱頑刁。試投白馬河，流水增汗淆。世有王者作，赫然命皋陶。吁嗟崇山、羽山放殛安所逃！吁嗟崇山、羽山放殛安所逃！（錢光繡 555-556）

雖求名奪利為人性使然，但若人未能把握分寸，面裝隱而背圖利，言行相悖太甚，淪為齷齪之徒，皆過而失中節也，難免為世訾議。

◎此論文初稿發表於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主辦的「中國文學『典律化』流變的反思國際研討會」(二〇二一年十月)，衷心感激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俾使本文更臻完善。

註釋

1. 例如錢謙益歿後出現的悼文、傳記，以及歷次刊行錢氏遺作的序跋文字中，漸次形成一條錢氏通往「典律化」的路徑，見嚴志雄(2015)，頁1-47。
2. 蒙匿名評審人賜示不能將文學當成史實的觀點，後學同意其說，在此重申本文立場：筆者援引的部分文獻屬於文學創作，但無意提出文學作品等同歷史真實的觀點，以免陷於真偽二元對立、文學與史學的材料何者有利於證明歷史的爭論。文中同時列舉文集、筆記、史書例子，恰與相關文學作品互為印證，說明了文學作品不完全出於虛構與想像。本文就著不同類別的文獻描述了清初一個風氣，但同時不誇大這就是清初的全部風氣，歷史本來就有多種面向與風氣。何況所謂「史實」多是後設的論述，是後人出於不同立場、需要建構出來的，史學家在寫作過程的取捨、詳略、排序、裁併也體現出「文學」筆法。若論證過程僅憑「體裁」摒棄文學材料，忽視其背後的歷史價值尤其是心態史價值，恐難呈現複雜多元的歷史面貌。今人研究歷史，或不必將「文學」與「史學」視作壁壘分明的場域，兩者的適時融通可收互補之效，一如趙園所言：「而且為我所利用的文字材料極其有限，我尚未做更廣泛的涉獵，比如對於詩詞歌賦，以及小說戲劇等等。這裏也有學養、精力的限制，甚至不得已的取巧：文集的文字作為表達的直接性、明確性，以及書札一類文字的某種『私人性』，便於我的利用。我當然知道，為我暫時擱置的那一部分文字，對於我的目的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利用」。見趙園(2014)，頁461-462。
3. 中國隱逸傳統的源流可參文青雲(2009)。
4. 本文對於「假隱士」的定義是：以歸隱或標榜歸隱的手段謀取「虛名」與「實惠」之士。
5.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瓠落的文學史》提醒我們：「一種文體相當於一個由許多文本組成的家庭，如果置之於不顧，那麼不可能寫出像樣的文學史。但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在同一文學史時期內縱跨各個文體的因素」。收入宇文所安(2003)，頁9。
6. 參何冠彪(1997)，頁15-22，對明季殉國人數之統計。

7. 西方學者提到，清初社會具有「法治與安定的反應」(law and order reaction) 的特性，人們期待的是和平與治安，在恢復舊秩序的訴求下，當時由清朝來實現安定的可能性，乃比抗清陣營為高，促使當時漢人支持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的活動(Spence & Willis xvii)。
8. 參見李瑄(2005)，頁 291-302。
9. 詳見楊念群(2010)，頁 191-192。
10. 參見陳永明(2011)，頁 27。
11. 此一觀點可參郭英德(2001)，頁 23-41。
12. 參見趙園(2001)，頁 126。
13. 呂留良在明朝活了十五年，在清朝活了近四十年，身閱二朝，結交不少遺民乃至叛臣，著述甚多，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學者、文人，亦是政權轉移的見證者，因此本文以其詩作為切入點，誠如卞僧慧所言：「呂留良一生的活動是多方面的，即以他的學術活動而言，也不僅僅只是利用八股文的評語宣傳他的反清思想。他在尊崇朱熹，提倡宋詩，纂修明史，研究醫學，以及詩文書法，刻印制硯等等，都有可記述的」(4)。
14. 《新唐書·盧藏用傳》：「司馬承禎曾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此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慚」(歐陽修、宋祁 4375)。
15. 嚴鴻逵《釋略》：「前半必有所指，而不明言，存厚也。巢端明，名鳴盛，禾人。注魏美，名颯，杭人。俱前孝廉，一存一沒。似杜詩〈存沒口號〉。近得語溪曹射侯家藏舊本，第三句注曰：『景宣。』第四句注曰：『蘭生。』蘭生姓徐，亦前孝廉，向與曹、注二公齊名」。俞國林據此指出：「景宣，陸圻字，又字麗京，錢塘人。蘭生，姓徐，名之瑞，臨安人，明崇禎九年丙子舉人。巢端明，名鳴盛，私謚正孝先生，嘉興人，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卒於清康熙十九年庚申，終年七十歲，崇禎九年丙子舉人。注魏美，名颯，錢塘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卒於清康熙四年乙巳七月，終年四十有八」(呂留良 2015: 446)。
16. 蒙匿名評審人指出，批評假隱者的人既深惡其行徑，但是又不能直接指名何人為假隱者，因為有可能觸犯當權的清政府，也有可能將來假隱者仕版於清廷而對批評者挾怨報復，則此一批評行為在批評者自身即感到潛在的威脅而必須自保，這就難怪批評者都對批評對象不願具名的原因。誠然，許多相關批評都有不具名的傾向，不過也有例外，如孫默廣泛徵集歸黃山詩文在明清之際是引人注目的大事，有些人以為他是著名的隱者，偶然相遇後才發現他依然忙碌於熱鬧的名利場，招致時人的議論紛紛，並提出具名的批評，詳見杜桂萍(2015)，頁 152、156。
17. 「園官菜把近來尊，值得王孫手共捫。妝點村莊何處好，數聲寒豹出籬根」。「雕欄曲護綠畦斜，土沃肥多易長芽。燕麥兔葵爭一笑，此間那有故侯瓜」(呂留良 2015a: 860)。
18. 計有袁穌、俞南史、汪琬、鄭梁、尤侗、陳騶、吳震方、勞之辨、鄺世培、黃宗炎、范芳、黃宗羲、顧湄、宋實穎、錢德震、錢中諧、徐樹丕、

曾燦、吳藹、徐樹滋、徐晟、吳爾堯、吳見思、李良年、張履祥。

19. 詳見《呂留良全集》羅列之和作，冊3，頁860-869。
20. 陸贄：「右欽澈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勛、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陸贄 445-446）。
21. 「自清朝來，就考者少，而入學者甚易。是年歲考，奉旨與考者作准，不與考者竟不作准矣，故上海秀才若老若幼、若貴若賤，俱抱佛腳赴考。時有作詩嘲之者云：『一隊夷齊下首陽，六年觀望已淒涼。當時惟恥食周粟，今日何妨補韃糧。頭上商量新結束，胸中打點舊文章。自知薇蕨終難咽，悔殺當初罵武王。』此詩雖俚，而切中時事，可以觀民風」。見姚廷遴(1982)，頁64-65。
22. 「皇朝初定鼎，諸生有養高行遁者。順治丙戌，再行鄉試，其告病觀望諸生，悉列名與考。滑稽者作詩刺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吃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聞者絕倒」。見褚人獲(2007)，頁1051。
23. 「先生長謠曰：『昔日齊夷以餓死，今日齊夷以飽死。只有吾鄉齊夷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全祖望 949）。
24. 「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為實錄。又吾邑吳蒼符（龍錫）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種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鵠板，江南惟有顧書年（謂顧寧人）』。又云：『薦雄徵犢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醪眾春園。』」（王應奎 68）。
25. 可參王汎森(2004)，頁187-247。
26. 詳見李劍鋒(2010)，頁145-150。
27. 在嚴志雄教授主持的「明清詩文講習會」，梁樹風博士曾分享這條材料，筆者深受啟發，謹此致謝。
28.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陶淵明 48）。
29. 《清史稿·鄭成功傳》：「騰書成功，謂宜收旁郡縣，以陸師急攻南京。成功扭屢勝，方謂明太祖陵，會將吏置酒，輝諫不聽。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江寧總管喀喀木等合滿、漢兵出戰，襲破新軍，諸軍皆奔潰，遂大敗。生得輝，殺之。成功收餘眾猶數萬，棄瓜洲、鎮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蘇巡撫蔣國柱遣兵赴援，化鳳亦還師禦之，成功戰復敗，引還」（趙爾巽 1976b: 9162-9163）。

30. 《清史稿·張煌言傳》：「廷臣與提督張杰謀致煌言，得煌言故部曲，使為僧普陀，伺煌言，知蹤跡，夜半，引兵攀嶺入，執煌言及綸，與部曲葉金、王發，侍者湯冠玉。煌言至杭州，廷臣賓禮之。九月乙未，死於弼教坊，舉目望吳山，嘆曰：『好山色！』賦絕命詞，坐而受刃，綸等並死」（趙爾巽 1976b: 9156-9157）。
31. 蒙匿名評審人指正，本文應將清初各種文類有機、有序地爬梳，比較「假隱」議題在不同文類中呈顯方式的同與異，以見其論述的歷時進展（鼎革之初至康熙前、中期，清初士人對「隱逸」之評價是否有所別異），藉此體現出引言強調的「分析不同類型文獻」的學術意義。此觀點給予筆者很大啟發，按時序分析不同文類對同一議題之描寫，不失為研究進路。惟部分材料難以繫年，全面分析相關文獻的體裁、語境、時段，則俟諸來日。

徵引文獻

- 艾衲居士(1931)〈首陽山叔齊變節〉。《豆棚閒話》。紫髯狂客（評）（上海：貝葉山房）。
- 卞僧慧(2003)《呂留良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 陳去病(1995)〈陳去病《明遺民錄自序》〉。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陳軾(2010)《續牡丹亭傳奇》。〔傳惜華藏古典戲曲珍本叢刊〕，第 15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
- 陳永明(2011)《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褚人獲(2007)《堅瓠集》。《清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戴名世(2000)《戴名世集》。王樹民（編校）（北京：中華書局）。
- 丁耀亢（清順治康熙年間）《丁野鶴集八種本》，第 2 卷（刻本）。
- 杜佳萍(2015)〈「名士牙行」與孫默歸黃山詩文之徵集〉。《社會科學戰線》no.1: 143-159。
- 傅山(2002)《霜紅龕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3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高力士(2001)〈感巫州薺菜〉。陳貽燠（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第 726 卷（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郭英德(2001)〈黃宗羲的人生定位與文化選擇：以清康熙年間為中心〉。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頁 23-41。

- 何冠彪(1997)《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黃宗羲(1985)《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黃宗羲(1985a)〈明夷待訪錄·原臣〉。黃宗羲 1985: 第 1 冊。
- 黃宗羲(1985b)〈大方伯馬公救災頌〉。黃宗羲 1985: 第 10 冊。
- 黃宗羲(1985c)〈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黃宗羲 1985: 第 10 冊。
- 黃宗羲(1985d)〈王義士傳〉。黃宗羲 1985: 第 10 冊。
- 黃宗羲(1985e)〈陸汝和七十壽序〉。黃宗羲 1985: 第 10 冊。
- 孔尚任(1957)《桃花扇》。第 4 卷(香港：宏智書店)。
- 李劍鋒(2010)〈明遺民對陶淵明的接受〉。《山東大學學報》no.1: 145-150。
- Li Wai-ye (2014)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李瑄(2005)〈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羣體之嬗變〉。《漢學研究》no.1: 291-324。
- 李顥(1996)《二曲集》。陳俊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 劉寶楠(1985)〈王巖傳〉。閔爾昌(纂錄)，周駿富(輯)：《碑傳集補》，第 3 冊(臺北：明文書局)。
- 呂留良(2015)《呂留良全集》。俞國林(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
- 呂留良(2015a)《呂留良全集》。俞國林(編)，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 陸贄(2006)《陸贄集》。下冊。王素(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 歐陽修(1974)《新五代史》。徐無黨(注)，第 54 卷(北京：中華書局)。
- 歐陽修、宋祁(1975)《新唐書》。第 123 卷(北京：中華書局)。
- 彭士望(1837)〈與王乾維書〉。彭玉雯(輯)：《易堂九子文鈔》(刊本)。
- 錢謙益(1996)《牧齋有學集》。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錢光繡(2003)〈昔日夷齊行〉。全祖望(輯)，沈善洪等(點校)：《續甬上耆舊詩》，第 50 卷(杭州：杭州出版社)。
- 清歷朝實錄館臣(1985)《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
- 清歷朝實錄館臣(1985a)《清實錄》。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
- 全祖望(2000)《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朱鑄禹(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邵廷采(1982)《東南紀事》(上海：上海書店)。
- 司馬遷(1982)《史記》。第 53 卷(北京：中華書局)。
- Spence, Jonathan D. & John E. Willis, Jr. (1979)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陶淵明(1979)《陶淵明集》。遼欽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王汎森(2004)《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王汎森(2020)《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
- 王應奎(1983)《柳南隨筆續筆》。王彬、嚴英俊(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 魏禧(2003)《魏叔子文集》。胡守仁等人(校點)(北京:中華書局)。
- 魏禧(2010)《魏叔子詩集》。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92冊,第四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文青雲 [Aat Vervoorn] (2009)《岩穴之士:中國早期隱逸傳統》。徐克謙(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 夏基(1693)《隱居放言》(刊本)。
- 嚴志雄(2015)〈錢謙益遺著於清代的出版及「典律化」歷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no.47: 1-47。
- 楊念群(2010)《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姚廷遴(1982)《歷年記》。〔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尤侗(1686)《西堂文集》(刻本)。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2003)《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田曉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張煌言(2002)《張忠烈公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張履祥(1871)《重訂楊園先生全集》。第4卷(江蘇書局刊本)。
- 張履祥(1871a)《重訂楊園先生全集》。第32卷(江蘇書局刊本)。
- 趙爾巽(1976)《清史稿》。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
- 趙爾巽(1976a)《清史稿》。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
- 趙爾巽(1976b)《清史稿》。第224卷(北京:中華書局)。
- 趙園(2001)《易堂尋踪: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羣體的敘述》(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趙園(2014)《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摘要

清初有關假隱士的描述、抨擊以及嘲諷為數不少,迄今尚無系統梳理此一現象的研究。本文採取「跨文類」的研究方法,在不同類別如詩歌、文集、史書、

戲曲、小說、筆記等的文獻基礎上，嘗試闡明：清朝定鼎導致漢人的政治立場搖擺，為假隱提供了動機；藉著呂留良詩作窺探士人對假隱風氣的鄙夷態度，並證明清初普遍文人對假隱風氣有過厭惡；最後闡述清初文人武將對仿陶者、仿夷齊者之批評連帶催生一些貶陶、貶夷齊之言論，藉此窺見在歷代批評假隱的「共相」話語之外的「殊相」。這些批評話語，生動而具體地勾勒了假隱士的行為與心態，可見「假隱」作為一種貪圖「虛名」與「實惠」的造作行為，確實在清初形成了一股「風氣」。隨著清朝政權的鞏固，這些批評持續出現，不失為一個側面窺見漢人漸漸就範於清朝統治的歷史進程，藉此瞭解到清初士人對清政權從抗拒至容受的政治立場、文化心態之轉折。

關鍵詞：清初、假隱風氣、假隱士、跨文類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alse Hermit Tren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NG Chi Lim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documents criticizing false hermit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is no relevant research so far. This article adopts a “cross-genre” research method. 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ocuments, it is expounded that the wavering political stance of Han people motivated the false hermit trend. By exploring the literati’s contemptuous attitude towards false hermits through Lü Liuliang’s poems, it is proved that the general literati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d aversion to false hermits. Under the false hermit atmosphere, the literati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ade some extraordinary derogatory remarks against Tao Yuanming, Boyi, and Shuqi. These critical words vividly outlined the behavior and mentality of the false hermits. It can be seen that “false hermits,” as an act of coveting fame and fortune, created an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g regime, these ongoing criticism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an people’s gradual submission to the Qing Dynasty’s rule.

KEY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False Hermit Trend, False Hermits, Cross-genre